权力：社会学的视野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田 鹏)

一、作为“隐学”的权力——韦伯之前权力观

自从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年)1838年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中正式提出“社会学”之后,“社会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¹开始登上西方社会思想史的舞台,阐释着属于社会学的权力观。同许多政治哲学家一样,早期社会学家同样也在思考“社会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经典问题,孔德认为,“社会有机体无法用物质手段结合为一个整体,只能用精神纽带……而最重要的则是宗教……除了语言和宗教,还有第三种因素使人和他的同伴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分工”。²而英国人赫伯特·斯宾塞(Hebert Spencer, 1820—1903年)类比生物学,提出社会有机体论,成为功能主义的先驱,但这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Social Darwinist)同样也未能不落窠臼,摆脱“智力与情感困难”的根源。³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 1858—1917年,一译埃米尔·迪尔凯姆或埃米尔·杜尔凯姆)批判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第一次相对系统地提出了功能主义范式,开创了属于法国的社会学时代。1893年,涂尔干发表了自己的博士论文——《社会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从道德的角度具体阐释了“社会是如何可能的”。前期的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ence或“共同意识”)具有社会整合和道德维持的作用。在公民道德世风日下的情况下,“就必须靠某个群体的权威来维持”,同时“集体的角色不仅仅在于再人们相互契约的普遍性中确立一种绝对命令,还在于它主动积极地涉入了每一规范的形成过程”。⁴这位社会道德家和法团主义者虽未能提出系统的权力学说,但他的“集体意识”的确对社会学家的权力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一直传到了反实证主义的故乡——德国。

¹ 参见 [法] 雷蒙·阿隆 著《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 胡秉诚 王沪宁 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63页。

² 参见 [美] 刘易斯·科塞 著《社会思想名家》石人 译[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9—10页。

³ 同上,第91页。

⁴ 参见 [法] 埃米尔·涂尔干 著《社会分工论》渠东 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0第16—17页。

二、“统治社会学”——韦伯的经典权力观

如果说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社会学奠基者未能自觉地意识到权力问题的话，那么德国社会学的集大成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年)无疑是经典社会学家中首次提出系统权力观的，也正是在韦伯之后，关于权力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一门“显学”。韦伯在其遗著《经济与社会》中首次详细阐述了他的经典权力观。韦伯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同时，他指出，“‘权力’概念在社会学上是无定形的。一个人的各式各样可以设想的素质和形形色色可以设想的情况，都可能使某个人有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贯彻自己的意志”。⁵韦伯的权力观是和其关于“合法性”、“统治”、“纪律”和暴力垄断的“国家”等理想型(Ideal Type)是紧密联系在一起。韦伯认为，统治“应该称之为在可以标明的一些人当中，命令得到服从”；而纪律“应该称之为在可以标明的很多人当中，根据约定俗成的态度，一个命令能够得到不假思索的、自动的和机械的听从”。⁶在“统治的类型”中，韦伯将合法性统治分为三种纯粹类型：

(1) 合理的性质：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的统治（合法型的统治）；(2) 传统的性质：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传统型的统治）；(3) 魅力的性质：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上(魅力型的统治)。

⁷韦伯在《统治的类型》该文后半部分，详述了基于不同合法性质的各种统治类型及政党和代议制等概念。美国社会学家、现代冲突论的代表人物刘易斯·科塞(Lewis A. Coser)认为，韦伯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扩展。在马克思看来，权力永远根植于经济关系中，即谁拥有生产资料就直接或间接地行使政治权力。但韦伯确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权力是主要形式，但经济权力可能来自非经济的权力，例如控制大规模官僚机构的人可以行使很大的经济权力，即便他们仅仅是领取薪金的雇员。质言之，韦伯多元权力观认为，行使权力的基础可以是多元的，要依社会背景，即历史的和结构的情况而定；而且韦伯还认为人们并不仅仅

⁵ 参见 [德] 马克斯·韦伯 著《经济与社会》(上卷) 林荣远 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第 81 页。

⁶ 同上，第 81 页。

⁷ 同上，第 241 页。

为了致富而谋求权力，因为权力，包括经济权力，其自身就可以有价值，谋求权力的做法常常是由权力所带来的“荣誉”决定的。⁸晚年的韦伯意识到，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登上了历史舞台，已成为一个赤裸裸的事实，无论道德化达到何种程度都无法消除世界舞台上对国家权力的争夺，似乎又回到了霍布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丛林法则”（Jungle Law）。但无论韦伯多么悲观地认为“整个权力和政治世界是一个邪恶的领域”⁹，都遮掩不住其多元权力观影响力之光芒。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本世纪（20世纪）初，韦伯提出的关于合法的概念、关于权力形式的三重类型说、关于国家和权力的定义以及关于社会权力结构的论述于五、六十年代流行于欧美，对权力社会学系统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¹⁰。

三、功能主义视角下的权力观——以帕森斯为例

1937年，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个名叫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1902—1979年）的韦伯追随者¹¹，出版了《社会行动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一书。也许连这个自称“无药可救的理论家”自己都没想到，他的这本书不仅“挽救”了社会学中功能主义范式，同时也宣告了一个属于他自己时代的到来，同时也将西方社会学舞台的重心由欧洲转向美国。帕森斯的宏大理论最初在批判性吸收了韦伯的行动理论之后，从“意志性行动”这一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开始的，即帕氏所谓的“单位行动”（unit action）。帕氏认为，唯意志论的单位行动应该将行动者面临的情境条件考虑在内；而社会行动包括一个或多个行动者一系列的单位行动¹²。帕森斯的社会系统论是以“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这一经典问题为前提的。因此，帕氏从其“单位行动”的微观分析自然就过渡到了“社会系统”的宏观结构分析，这种理论过渡

⁸ 转见自 [美] 刘易斯·科塞 著《社会思想名家》石人 译[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第 202 页。

⁹ 同上，第 226 页。

¹⁰ 转见自 卢少华 徐万珉 著《权力社会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第 3 页。

¹¹ 帕森斯经常说他进入海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Heidelberg），并直接接触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学识实在是一种意外之喜。1927年，帕森斯以《韦伯与佐姆巴特著作中的资本主义精神》一文，获得了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20世纪30年代中期，帕森斯翻译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将韦伯的思想从德国带入了英语世界。参见 [美] 乔治·瑞泽尔 主编《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家指南》凌琪 刘仲翔 王晓修等译[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第 393—396 页。

¹² 参见 [美] 乔纳森·特纳 著《社会理论的结构》邱泽奇 张茂元等 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第 37 页。

就体现在其第二本著作《社会系统》(The Social System)中。乔纳森·特纳认为,“随着各种不同取向的行动者(不同行动和价值取向的不同结合)互动,就会逐渐产生约定,并维持互动模式,这就是‘制度化’。以帕森斯的观点看来,这种制度化模式可称之为社会系统”。¹³同时,帕氏认为,“……强制乃是对他人施行权力……为了使包括许多个人的行动体系有可能成为稳定的体系,对于该体系之内个人之间关系的权力方面必须加以规范性的节制。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有一个分配秩序。社会行动体系的这一双重性的方面,亦即权力关系和秩序关系的问题,就其可以视为对于权力斗争的解决之道而言,就给行动体系带来了另外一系列相对而言极其明显的伴生性特性。这些特性可称为政治性的行动成分”¹⁴。从帕氏的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到,要解决霍布斯的难题,就必须对权力进行规范和节制。因此,如何节制权力就成为帕森斯不可回避的问题。“要解决权力问题以及社会性行动体系的许多其它复杂特性,都涉及到对诸多个人进行整合的问题,而这又牵涉到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它体现在制度性规范的合法性中,也体现在仪式和各种表达方式中。所有这些现象反过来,又都关涉到社会行动体系的一个单一的伴生性特性,我们可以称之为‘共同价值的整合’(common-value integration)”。¹⁵显而易见,帕氏认为,用“共同价值的整合”来实现权力的规范,最终使社会秩序成为可能,从而在理论上回答了霍布斯的问题。在帕森斯的思想发展的后期,发生了功能强制主义转变,提出了“功能强制”这一概念,成为其后期一般行动理论的核心。1956年帕森斯与斯梅尔塞合著的《经济与社会》中,行动理论被表述为:结构的功能在于满足系统的必要条件。¹⁶帕氏认为,任何系统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满足四种功能必要条件(functional prerequisites)或需要,即(a)适应的功能(Adaptation):从外部环境获得足够的资源并在系统中加以分配,以适应其环境;(b)达鹄(一译“目标获取”)的功能(Goal Attainment):最大限度地利用其资源去实现系统的目标;(c)整合的功能(Integration):每一个体系都必须维持其各部分之间的内部协调,并发展出对付越轨现象的方法;(d)维模的功能(Latten Patten Maintenance):

¹³ 同上,第39页。

¹⁴ 参见 [美] 塔尔科特·帕森斯 著《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 夏遇南 彭刚 译[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2008 第765—766页。

¹⁵ 同上,第766页。

¹⁶ 转见自 [美] 乔纳森·特纳 著《社会理论的结构》邱泽奇 张茂元等 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第42页。

该功能包含两个有关问题，即维持模式和调停紧张。¹⁷这就是帕氏著名的“AGIL功能分析模式”。显然，此时的帕森斯关注的重点是从控制论的角度说明系统内部和外部之间的能量和信息交换关系。¹⁸因此，在这一时期帕氏的理论中，权力——类似于货币——被当做系统间的“一般符号交换媒介”，即就像“适应”将货币用作和其他三部分进行交换的媒介一样，“达鹄”用权力（即引致他人服从的能力）作为自己首要的交换媒介。¹⁹帕氏的这种权力媒介观点被后来德国系统功能主义者——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 1927—1998年)所“扬弃”，并用交往媒介理论将帕森斯的这一观点系统化。帕氏后期的分析似乎不再是社会学式的了，而带有了很浓的思辨哲学意味，或充其量是一种巨型思辨的设想。也许正如特纳所言，“自从1937年提出的单位行动以来，帕森斯走得的确太远了”。²⁰帕森斯这种保守倾向的巨型思辨理论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及世界格局的动荡不安，而出现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之枯竭”之困境，最终为世人所“冷落”。“现在谁还读斯宾塞的书”，也许当年帕森斯抛出这句话的时候就早已预示着“现在谁还读帕森斯的书”这一喜剧式的结局。但无论结局如何，就像韦伯曾对他在慕尼黑的一个学生所说的，“判断一个当代学者，首先是当代哲学家，是否诚实，只要看他对待尼采和马克思的态度就够了。凡是不承认没有这两个人所作的贡献就没有自己的大部分成就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在其中从事学术活动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思和尼采创造的”²¹，可以豪不夸张地用韦伯这个判断标准来描述帕森斯——对帕森斯的态度也许能反映一个学者的诚实度，因为毕竟在主流社会学范式“三足鼎立”²²之格局中，帕森斯独占其一。

四、作为一种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之权力——卢曼的权力观

卢曼在《权力》开篇中就指出了将媒介交往理论作为权力理论基础的优势所

¹⁷ 参见于海著《西方社会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93—394页。

¹⁸ 参见侯钧生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三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第176页。

¹⁹ 参见[美]乔纳森·特纳著《社会理论的结构》邱泽奇张茂元等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第45—46页。

²⁰ 同上，第49页

²¹ 转见自[美]刘易斯·科塞著《社会思想名家》石人译[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219页。

²² 美国著名理论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在其成名作《社会学：一门多元范式的科学》中，借用库恩“范式”(Paradigm)的概念，概括出当前社会学中的三种基本范式：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事实范式、以韦伯和早期帕森斯为代表的社会释义范式和以霍曼斯为代表的社会行动范式。转见自[美]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著《后现代社会理论》(Postmodern Social Theory)[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序言第1页。

在，“人们有可能把权力与不同种类的交往媒介作比较，使用同一的组合问题——例如，将它与真理，或与货币相比较。因此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澄清权力现象，同时还有助于产生更广泛取向的比较兴趣，并促进不同媒介领域的理论见解的交换”²³。那卢曼是如何研究这种作为交往媒介的权力的呢？乔纳森·特纳认为，作为一个系统论者，而非功能主义者，卢曼倾向于用这样的思路来分析系统过程：通过减少环境的复杂性来满足主导的功能必要条件。同时，卢氏认为，使行动者变得相关并由此产生社会系统的基本机制是通过符号代码（如话语和其他媒介）的沟通。²⁴循着这一分析进路，卢氏首先批判了传统的权力观，他认为，“迄今为止在权力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因果观念还没有被抛弃，但必须被转换成为抽象的形式”²⁵；卢氏认为用一个定义（或范畴）来说明权力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是难以概括的，但他提出了交往媒介理论与传统的权力理论之差异：“大部分重要差异或许在于：交往媒介理论以代码与交往过程的差异为基础，用概念阐明权力现象，而不是站在一个立场上把权力作为一种资质或能力归之于伙伴的一方”，质言之，权力是代码指导的交往。²⁶那媒介交往理论视角下的权力理论主要研究哪些问题，或者说研究权力的哪些方面呢？卢氏认为，“权力媒介模式化的社会事实，对权力理论而言有必要同时考虑两个层面：作为潜在的权力构造的生成条件和结构条件，权力实施的结构条件和处境条件”。²⁷沿着这种分析思路，卢氏在《权力》的后半部分具体分析了权力与物质暴力、权力的风险、权力与社会的关联以及组织的权力问题。

五、《权力精英》——美国权力问题大讨论的开篇之作

二十世纪中叶，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开始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由于其社会均衡模式导致的保守主义倾向，激进的冲突学派成为其最尖锐的批判者之一。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就是代表之一。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人们关于权力的核心问题是各种关于无权无势(Powerlessness)与支配以及两者

²³ 参见 [德]尼古拉斯·卢曼 著《权力》翟铁鹏 译[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第 5 页。

²⁴ 转见自 [美]乔纳森·特纳 著《社会理论的结构》邱泽奇 张茂元等 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第 51 页。

²⁵ 参见 [德]尼古拉斯·卢曼 著《权力》翟铁鹏 译[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第 13 页。

²⁶ 同上，第 17 页。

²⁷ 同上，第 29 页。

之间的关系。²⁸而这场主要由政治学家主导的权力大争论的始作俑者正是米尔斯于 1956 年出版的一本著作——《权力精英》(Power Elites)。米尔斯在这本著作的开篇就表明了他的“精英权力观”：“当信息与权力的手段被集中起来的时候，某些人在美国社会中逐渐占据了可以高高在上往下蔑视他人的位置，也就是说，他们的决策能够强烈地影响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世界……因为他们主宰着现代社会中主要的等级制度和组织：他们管理着大型企业；他们支配着现代国家机器并且拥有各种特权；他们控制着军事组织；他们占据着社会结构中的战略性指挥地位，所有这一切集中了他们所享有的权力、财富与社会声望的各种有效手段”²⁹。米尔斯的“精英权力观”展露无疑，美国社会由权贵集团——企业、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和军方所统治着，而普通人的各项权力被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所约束；精英统治集团和普通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激进的米尔斯看来成了一种类似“零和博弈”的游戏。就在米尔斯《权力精英》出版之后的两年，耶鲁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中发表了题为“统治精英模式批判”的文章，对以米尔斯为代表的“权力精英观”提出了十分尖锐而明确的批判：“……米尔斯教授与亨特教授都没有认真地尝试着通过解释一系列明确具体的事例来检验其主要的理论假设。”³⁰达尔的这种批判最直接地体现在他的著作——《谁统治谁?》(Who Governs?)中。在该著作中，达尔研究了纽黑文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权力与决策制定，批判的矛头直指“统治精英模式”和各种受到马克思主义激励的“统治阶级模式”。其方法论集中在决策制定上的“行为主义”，即本质上将权力等同于权力的运用。这也是他在方法论上批判两种权力模式的局限性，即未能通过事例来检验权力的运行。达尔的这本著作的实质性结论或者调查结果通常被贴上了“多元主义”的标签，即他通过各种不同的行动者与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不同的问题领域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事实表明，不存在包揽一切的“统治精英”，权力的分布是多元的。³¹如果说激进的米尔斯被称之为精英论者(或权贵论者)的话，则达尔可以被称之为多元论者。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无论其主观上是否为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民主制进行辩

²⁸ 参见 [美] 史蒂文·卢克斯 著《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彭斌 译[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导论 第 1 页。

²⁹ 同上，第 2 页。

³⁰ 同上，第 4 页。

³¹ 同上，第 5—6 页。

护，达尔的多元论权力观的确激发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拓展了激进精英论的权力观。质言之，“多元论者认为权力只能从决策这个角度看，只有当人们直接参与具体的决策，才能称得上拥有权力。他们把与社会机构最上层的职位相联系的权力称之为‘潜在的’权力，把表现为积极参与决策的权力称之为‘实际的’权力……多元论者同时指出，从精英角度作研究，总是忽略了领导集团内部的派别斗争和利益冲突。他们抨击‘垄断政治机器’和‘精英政治’一类的观点，强调‘多重决策中心’和‘平衡论’一类的概念”³²。

六、卢克斯的权力观——一种激进的观点

虽然达尔教授把矛头直指当时的“精英权力观”，但他的著作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更多学者（尤其是政治学者）的广泛参与和激烈争辩；而所有这一切争论都在不久之后的另一本著作的出版而达到了高峰。斯蒂文·卢克斯(Steven Lukes)于1975年出版的《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权力争论推向高潮。

沿着达尔教授的“行为主义”分析进路，卢克斯提出了著名的“三维权力观”，他认为，到目前为止的所有有关权力的争论，无非不过两种权力观（即一维权力观和二维权力观）之间的差别。具体而言，一维权力观涉及到在关于某种议题——在这个议题上，存在着可以观察到的（主观的）利益冲突——的决策制定中对行为的关注，它被看做是表达各种政策偏好并且可以通过政治参与的方式显示出来。³³而二维权力观涉及到对一维权力观以行为为中心(behavioral focus)的有所保留的批评，并且它考虑到了预先防止那些决策接纳各种潜在议题的方式——在这些潜在的议题中，包含着那种被认为体现在表达各种政策偏好和亚政治的愤恨(sub-political grievances)中的可以观察到的（主观的）利益冲突。³⁴而卢克斯的三维权力观则对在对一维权力观和二维权力观的“扬弃”：“三维权力观涉及到对前面两种过于个人主义的以行为为中心的观点的彻底批评，同时也对各种潜在的议题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的诸多方式进行了考虑，无论这种排除是通过运用各种社会力量或者制度惯例的方式还是通过个人决策的方式进行的……人

³² 参见 卢少华 徐万珉 著《权力社会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第8—9页。

³³ 参见 [美] 史蒂文·卢克斯 著《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彭斌 译[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第7页。

³⁴ 同上，第12—13页。

们在这里所经历的是一种潜伏的冲突(latent conflict)，它存在于那些运用权力者的利益与被他们排斥的人的真正利益之间的矛盾中。”³⁵卢克斯也许受到马克思关于“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影响，他始终坚持认为，“任何权力观都依赖于某种规范的特定的利益概念”。³⁶这也是他的三维权力观与前两种权力观最本质的区别之处，即利益。高宣扬在评论这三种权力观时认为，单向度权力观（即一维权力观）只看到权力行使过程中的行为效果，并把权力的大小直接表现在行为者的行为性质和形式上；双向度权力观（即二维权力观）除了分析和探讨行为者之间的某些外显冲突以外，还深入研究权力结构中那些不明显的“压制面”；至于三向度权力观（即三维权力观），则充分考虑到权力行使过程中极其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充分考虑到权力是集体力量社会安排的一个“函数”。这就避免了单向度和双向度权力观局限于个体间的决策和行为层面分析权力的片面性。同时，三向度权力观还把权力的分析从实际冲突延伸到实际冲突的消弭。高宣扬同时指出，单向度权力观采取了自由主义的利益观念，双向度权力观采取用了改革主义的利益观念，而三向度权力观则采取“激进的利益观念”(radical conception of interests)，并以“实际利益”(real interest)诠释“利益”³⁷。

七、为权力“辩护”——科塞的冲突论

如果说米尔斯《权力精英》的影响之一是引发了由美国政治学家主导的权力大争论的话，那么，其另一个作用就是在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失去“一统天下”的局面后，将冲突重新引入社会学家的视野中。美国冲突社会学派中最富盛名的当属英籍德裔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受马克思阶级冲突的直接影响，提出了“辩证冲突论”。达氏在借鉴了马克思的阶级观、辩证法和阶级斗争思想后，提出了自己的冲突观。社会冲突理论作为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反思和对立物而言，达氏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社会观，即“现代的两面性”，即革命和生存机会的并存。³⁸由该辩证社会观出发，达氏提出了他的辩证冲突观：冲突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而不是由于经济因素引起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

³⁵ 同上，第16—17页。

³⁶ 同上，第27页。

³⁷ 参见高宣扬著《当代西方社会理论》(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292—293页。

³⁸ 参见[英]拉尔夫·达仁道夫著《现代社会冲突》林荣远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8页。

各利益集团各司其事，这样虽时常会有一些小的冲突，但却限制了严重冲突的集中爆发。³⁹如果说，权力在帕森斯和卢曼看来是社会秩序成为可能的媒介之一的話，那么，冲突论者则持有相反的权力观，即权力是引起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权力似乎成了冲突的“罪魁祸首”。但传统冲突论者的“冲突负功能说”为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的“冲突正功能说”所驳斥。科塞为权力进行了“辩护”。科塞受齐美尔的影响认为，社会冲突是一种社会化的形式，是一种过程，它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维护社会有机体或社会子系统的重要功能。⁴⁰同时，科塞持多元论的观点，认为权力并非是导致冲突的唯一根源，甚至不是主要根源。他将冲突的根源分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大类，而权力只是物质性根源中的一种，科塞对非物质根源，即价值观的影响非常重视，认为权力等物质性因素的分配不均并非必然导致社会冲突。受齐美尔形式化冲突的影响，科塞提出了冲突正功能，即著名的“安全阀制度”：在不毁坏结构的前提下使敌对情绪得以释放出来以维护社会整合的一种制度。至此，传统冲突论者眼中的“罪魁祸首”——权力，在科塞的“安全阀制度”中得到了“正名”：权力并非秩序的破坏者，因为在安全域值内的冲突在重新分配权力的同时也维持了社会秩序。

八、交换论视角下的权力权——以布劳为例

同样作为功能主义范式的反思与对立物的交换论，受功利主义经济学、功能主义人类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社会行动范式(瑞泽尔语)。而其集大成者无疑是彼得·布劳(Peter M. Blau, 1918—2002年)。布劳的交换论是对乔治·霍曼斯(George C. Homans, 1910—1989年)这位“彻底的心理还原论者”的批判后形成的，体现于其著作《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中。首先，布劳给社会交换下了这样的定义：“广义的社会交换可以被看成是下列事实的基础：群体之间的关系和个体之间的关系、权力的分化和同辈群体关系、对抗力量之间的冲突和合作、亲密的依恋和一个没有直接社会接触的社区中的关系疏远的成员之间的联系”⁴¹。布劳根据韦伯和陶奈关于权力的定义，将权力概念扩展为，“通过威慑——以撤销有规律地提供的报酬的形式，或以惩罚的形式，

³⁹ 同上，第3页。

⁴⁰ 参见 侯钧生 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三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第1208页。

⁴¹ 参见 [美] 彼得·M·布劳 著《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李国武 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第37页。

因为事实上前者和后者都构成了一种消极的制裁——个人或群体不顾他人反抗，将其意志强加给他人的能力”⁴²。布劳指出，“向其他人提供必要的利益毫无疑问是获得权力的最普遍的方法，尽管不是唯一的方法——因为也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得权力，即威胁说，除非他人服从，否则他就剥夺他们当前所享受的利益。尽管惩罚的威胁施加了最严厉的约束，但它也导致了依赖，而这种依赖可谓是权力的间接来源，而能够被扣留的经常性基本报酬则是权力的直接来源”⁴³。质言之，布劳认为权力来源于单方面的依赖和义务。因此，布劳的权力具有反复性、强制性和不对称性三个特征。如何摆脱社会交换中的依赖关系，从而逃脱权力的束缚呢？布劳借助埃默森的“权力—依赖关系”，设计了这样的方案：“（1）战略性资源能增进独立性；（2）存在可以获得所必需之服务的替代性来源也可以促进独立性；（3）运用强制力量迫使别人给予必要的利益或服务的能力；（4）缺乏对各种服务的需要”⁴⁴；即“如果人们没有充分的资源，如果他们没有令人满意的替代方案，如果他们不能使用强制力量，如果他们的需要是迫切的，那么能够提供满足这些需要的利益的人或群体就获得了支配他们的权力”⁴⁵。这四种用于摆脱交换中由于不平等引起的权力—支配关系的方法，也是权力产生和维持的必要条件。布劳接着分析了权力分化、权力消耗以及再生产等问题指出，权力的分化出现在对稀缺物品的竞争过程中；同时权力在使用过程中被消耗的，但也能够冒着一定的风险被投资以生产更多的权力。⁴⁶鉴于对霍曼斯心理还原论的批判，认为社会交换具有突生的属性，不能用纯心理学的微观解释来分析所有社会交换行为。因此，布劳将自己的交换理论成功过渡到了结构交换分析，即对大型科层组织中的权力分析，提出组织权力合法化如何转化为权威，以及对现存权力的反抗等问题，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权力观。概言之，作为一个交换论者，布劳的权力观以微观的人际交换为逻辑起点，分析权力产生的条件、分化的过程以及权力再生产的风险等问题，从而过渡到大型科层组织中的权力问题，包括权力合法性、权威关系以及突生领导关系和权力反抗等问题。笔者认为，布劳权力观的真正魅力在于其对交换行为的微观心理分析，展示作为一种支配能力的权力在人际交换

⁴² 同上，第 178 页。

⁴³ 同上，第 179—180 页。

⁴⁴ 同上，第 180—183 页。

⁴⁵ 同上，第 207 页。

⁴⁶ 同上，第 207—208 页。

中的运作过程。

九、一致抑或冲突：权力观的两种预设

在社会学的理论中，传统权力观总是把权力视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关系。而这种传统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权力观又往往基于两种不同的范式：

(1) 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社会行动范式，这种社会行动范式为后来的冲突理论所接受并发展成冲突范式的权力观。

(2) 以塔尔科特·帕森斯为代表的功能主义范式。如果说韦伯的权力观是基于冲突假设，则帕森斯的权力论观则是基于一致假设，即认为权力“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单位履行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⁴⁷。但不幸的是，由于帕森斯用一致代替了韦伯的冲突，因此其关于权力的定义解决的问题远比它造成的问题要少。

上述两种权力观，无论是基于冲突假设的韦伯学派，还是基于一致假设的帕森斯学派，都未能全面地看待权力问题，前者忽视了互惠的权力关系，而后者则忽视了权力的冲突特性。因为现实社会是冲突和一致的综合产物，即冲突和一致是社会的一体两面，这就要求社会权力观必须同时兼顾冲突和一致。而社会学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多元综合”趋势正迎合了综合权力观的需要。

十、权力研究的“关系转向”——后现代视角下的权力观（以吉登斯和布迪厄为例）

“理论整合是人类知识演变乃至人类生存与发展进程当中不可消弭的一种需要，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理论分化可能会以一种比以往更强劲、更普遍的势头产生出来，但这也必将刺激和推动理论整合活动以同样强烈与普遍的势头发展起来。因此，分化与整合仍然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基本态势”⁴⁸。正如谢立中教授所预言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帕森斯的逝世，西方社会学理

⁴⁷ 转见自 罗德里克·马丁 著《权力社会学》丰子义 张宁 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2 第 86 页。

⁴⁸ 参见 谢立中 著《社会理论：反思与重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第 25 页。

论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综合态势，多种带有强烈整合色彩的综合理论框架相继粉墨登场，共同将新千年的社会学演绎成一门瑞泽尔所谓的“多范式的科学”。

在这样的理论时代背景下，社会学中的权力观一反从前的权力—支配二元对立范式，在方法论的关系主义的前提下，在实践过程中实现了传统权力观的整合和超越。“结构化理论”的提出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著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中首次提出了权力观的“关系转向”。吉登斯首先剖析了两种传统的权力观：“一方面存在着大量把权力看作是行动者实现其目的之能力的权力观，这种权力观尤其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得到最广泛的使用。另一方面，又存在一种把权力主要看作是集体特性的权力观，这一立场的现代版本包括帕森斯、福柯等人的权力观”⁴⁹。同时吉登斯指出，两种权力观都涉及对支配的不同理解：第一种权力观将支配“看作是个体决策者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实现其目标的网络能力”，但吉登斯认为，这种支配途径无法处理权力的结构特征；第二种权力观把支配“看作社会系统的结构特征”；但这种支配途径的局限性就在于仅仅把权力看作是由结构所决定的，而不是存在于人类行动中并通过人类行动得到运作。⁵⁰因此，吉登斯认为，“如果我们能够从结构二重性的角度理解支配/权力范畴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这两种权力观实际上是一种互补关系”；吉登斯接着解释道，“资源是行动者在具体互动中所利用到的社会系统的结构性要素。社会系统由规律性的实践所组成，存在于这种实践中的权力关系可以被看作是互动过程中自主与依赖之间的再生产关系”⁵¹。质言之，结构化理论视角下的权力观超越了社会学中传统主/客体二元论，能够弥合两种权力观及其相应的支配途径各自的局限性。

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通过方法论的关系主义试图超越社会学传统中的主体/客体二元对立。他沿着吉登斯的权力/支配分析进路认为，“理解这种特殊支配形式的唯一方式是，超越那种在（通过武力的）强迫与（符合理性的）同意之间和在机械式的强制与自愿的、自由的、深思

⁴⁹ 参见 [英] 安东尼·吉登斯 著《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郭忠华 译[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第 49 页。

⁵⁰ 同上，第 49—50 页。

⁵¹ 同上，第 50 页。

熟虑的甚至是蓄意的谦卑恭顺之间强行作出的区分与选择”⁵²。布迪厄在其著作《语言与符号权力》中提出了“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概念。他认为符号暴力就是“在一个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暴力……社会行动者是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knowing agent),甚至在他们受制于社会决定机制时,他们也可以通过形塑那些决定他们的社会机制,对这些机制的效力‘尽’自己的一份力”。⁵³因此,符号暴力是一种温和甚至对它的受害人而言是察觉不到的和无形的暴力;同时,符号支配(无论是种族、性别、文化还是语言等方面的符号支配)的作用将塑造出布迪厄所谓的“惯习”(habitus),也就是那些生产出“实践感”并且使行动者对世界的想象系统化所体现出来的性格倾向——它处于那种在某种程度上抵制清晰明确的表达、批判性的内省以及故意操纵的意识水平之下。概言之,布迪厄通过符号暴力的方式所陈述的支配思想在于,“支配效用的结果与条件以性格倾向的形式持久地与深深地嵌入身体中”,⁵⁴即形成了适应于不同场域的惯习。布迪厄符号暴力概念在其后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在其早期关于卡比尔地区的人类学研究中,布迪厄指出,卡比尔社会中的礼物赠送是一种以慷慨为幌子来约束他人的方式,即运用“归化”(naturalization)的方式,即通过使被支配者错误识别其运作模式与资源的方式,将权力符号化。同样布迪厄在著作《区隔》(Distinction)中,用奇妙的、小说式的细节描述出,当人们将他们自己划成类别并且使他们自己受到这些分类的影响时,在像艺术、运动、新闻阅读、室内装饰、食品消费、语言习惯与身体审美观等领域中地位差异是通过什么方式得以维持与巩固的,即阶级斗争转化为“分类斗争”(classificatory struggle)。⁵⁵质言之,布迪厄的权力/支配策略是通过将各种条件与性格倾向的“归化”,产生了不由自主的与无意识的结果,是一种将社会结构“铭刻”进身体中的策略。⁵⁶布迪厄温和的“符号暴力”似乎让人想到了法国另一位迷宫式人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年)关于“惩罚的温和方式”之论述。而无论福柯的学说受到何种质疑,

⁵² 转见自 [美] 史蒂文·卢克斯 著《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彭斌 译[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第138—139页。

⁵³ 参见 [法]皮埃尔·布迪厄 [美]华康德 著《实践与反思》李康 李猛 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第221页。

⁵⁴ 转见自 [美] 史蒂文·卢克斯 著《权力:一种激进的观点》彭斌 译[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第140页。

⁵⁵ 同上,第141页。

⁵⁶ 同上,第142页。

他激进的权力观的确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

文章来源： 作者投稿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